

國家圖書館古籍蒐購與鄭振鐸

顧力仁 阮靜玲

摘要

民國29至30年間，時在中日抗戰，上海已經淪陷，當時江南散出的藏書紛紛在此求售，以致各方競購。淪陷區中若干學人憂心文獻流落異域，國故不存，遂籌組「文獻保存同志會」，在國民政府的支持下，與時在重慶的中央圖書館合作，展開大規模的善本古籍蒐購行動。兩年間雖然在敵偽環伺下倍感艱辛，但是蒐購成果卻相當豐碩，不但即時搶救了許多重要藏家的精品，並且奠定了中央圖書館的善本收藏，進一步充實中央圖書館所藏的明代史料，而成爲日後獨步全球的館藏特色。鄭振鐸當時身在上海淪陷區，是蒐購行動的關鍵人物，他不但連絡各方、擘畫全局，更身兼訪書、論價、編目……等等多種角色，鄭振鐸學諳中西，醉心國故，更留意邦國文獻；他本身既是文學家，也是愛書人，更投身於史料文獻的整理工作。本文首先概述上海淪陷區蒐購古籍的大要，再詳述當時的購書目標及購書方法，並且將蒐購的成果分析歸納爲四個特色，分別是：明代史料、四庫相關著述、宋元版刻、鈔校本及稿本，最後強調鄭振鐸在整個蒐購行動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取資於許多當時的檔案及書信，包括鄭振鐸爲蒐購工作所寫的歷次報告書、鄭振鐸與中央圖書

關鍵詞 (Keywords)：鄭振鐸；中央圖書館；明代史料；善本古籍；國家圖書館

Cheng Chen-tou；Chinese Rare Collection；Documents Preservation
Comrades；Library Archives；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顧力仁：國家圖書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編審；E-mail: klj@ncl.edu.tw

阮靜玲：國家圖書館特藏組助理編輯；E-mail: cljuan@ncl.edu.tw

館蔣復璁館長的信函、鄭振鐸與「文獻保存同志會」先進張壽鏞的信函。這些檔案及書信有幸保存至今，成為吾人瞭解當時工作的第一手史料。本館正在整理館藏史料檔案，並且已將抗戰時期蒐購古籍相關檔案整理完畢，透過目前有關此一蒐購工作已公佈及未公佈的資料，可以進一步描繪出鄭振鐸在整個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特別是從鄭振鐸的個人書信中可以窺見他的思緒脈絡，所以本文也顯示了書信所具有的文獻價值。

一、前言

民族文獻、國家典籍為子子孫孫元氣之所系，為千百世祖先精靈之所寄。若在我輩之時，目覩其淪失，而不為一援手，後人其將如何怨悵乎？！

鄭振鐸^[1]

「為子孫百世留些讀書餘地，乃我輩之素志。誠不願將來研究國故朝章者，非赴國外留學不可。」^[2]這段話摘錄自鄭振鐸在民國30年初寫給時任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的信函。當時抗戰方酣，太平洋戰爭尚未開始，中國獨力面對日本強大的兵力節節敗退，東南半壁已陷敵手，國民政府退守西南。鄭振鐸身在上海淪陷區，與張壽鏞、何炳森、張鳳舉等人共組「文獻保存同志會」，在後方國民政府以及中英庚款董事會的支持下，和中央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合作搶救戰爭中散出的古籍。自民國29年初到30年底，兩年之間成果豐富，質量兼具，特別是建立了館藏宋元刊本和明刊史料、文集的重要特色。如今，本館收藏上萬部善本書，其中超過三分之一即是由「文獻保存同志會」蒐購而來，而由「文獻保存同志會」蒐購而來之此一館藏特色也馳名國際。同志會於抗戰期間在淪陷區冒險搶購古籍，不僅是古今藏書聚散的佳話，也是國家保存文獻的具體作為，同時更實現了與役諸君當時的期待「為子孫百世留些讀書餘地。」

記錄抗戰期間在淪陷區搶購古籍的檔案及部份書信目前保存在本館，三十年來陸續被各方利用介紹並發表不少文章。^[3]大陸也曾將鄭振鐸寫給張壽鏞的270

^[1] 鄭振鐸，〈文獻保存同志會第三號工作報告書〉。

^[2] 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編輯委員會，〈館史史料選輯〉，《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6：1（1983.4），頁89。

^[3] 三十年來陸續被利用介紹發表不少文章：

(1)蘇精著，《近代藏書三十家》（臺北：傳記文學，1983）。

封信函予以出版。^[4]透過這些書信和檔案以及若干已發表的文章，讓我們對這段70年前蒐購古籍的各方面有完整而鮮明的瞭解，包括：

- (一)蒐購古籍的原委、購書目標、各方面競購的激烈；
- (二)文獻保存同志會的成員、運作、和中央圖書館彼此間的連繫；
- (三)兩年間與藏書家及書賈之間的互動，陸續購得古籍的特色；
- (四)購來古籍的內運，部份被劫運到日本以及尋覓復歸的過程。

本館目前正在進行館內檔案中鄭振鐸書信的整編出版，在整理過程中讓我們有機會重新回顧這件與館藏善本古籍具有密切關係的蒐購往事，雖然蒐購的經緯多已見諸文章。但是因為整個蒐購過程以上海淪陷區為主，而在上海的蒐購細節有若干值得稱述之處，所以藉此整理機會再就同志會的報告書以及鄭振鐸給蔣復璁和張壽鏞的書信，將當時蒐購的幾個關鍵處加以描述，包括購書目標及蒐購成果；此外，由於鄭振鐸在整個蒐購行動中扮演樞紐的角色，無論在蒐購報告書或是給蔣復璁、張壽鏞的書信中，他不時流露出熱愛文獻、關注文化的真誠情懷，所以文內也兼述鄭振鐸如何護持古籍。

抗戰期間，在淪陷區蒐購古籍絕非一地一人可以成事，有此豐碩成果端賴眾志卒能成城。影響蒐購有成的因素很多，包括經費籌措適切、購書目標正確、版本審訂精詳、策略運用得宜、團隊合作成功，這些因素是我們從過去的歷史以及先進的風範中應該學習的。

(2)同註2，頁57-104。

(3)林清芬，〈國立中央圖書館與「文獻保存同志會」〉，《國家圖書館館刊》，87：1（1998.6），頁1-22。

(4)陳福康，〈鄭振鐸等人致舊中央圖書館的秘密報告〉，《出版史料》，2001：1（2001.1），頁87-100。

(5)沈津，〈鄭振鐸致蔣復璁信札（上）〉，《文獻》，2001：3（2001.7），頁249-275。

沈津，〈鄭振鐸致蔣復璁信札（中）〉，《文獻》，2001：4（2001.10），頁214-228。

沈津，〈鄭振鐸致蔣復璁信札（下）〉，《文獻》，2002：1（2002.1），頁216-231。

(6)盧錦堂，〈屈故館長翼鵬先生與國立中央圖書館在抗戰時期所蒐購我國東南淪陷區之古籍最精品〉，載於：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國家圖書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屈萬里先生百歲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家圖書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7），頁71-91。

(7)盧錦堂，〈抗戰期間中央圖書館搶救我國東南淪陷區散出古籍相關工作報告書之一考察〉，載於：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第一屆東亞漢文文獻整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尚未出版（臺北：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2008）。

[4] 劉哲民、陳政文編，《搶救祖國文獻的珍貴記錄：鄭振鐸先生書信集》1版（上海：學林出版社，1992）。

二、淪陷區蒐購古籍述要

(一) 蒐購的開展

我國江南久來文風鼎盛，藏書薈萃，抗戰期間江南私家所藏典籍是如何散出？有那些方面競購這些典籍？而當時國家的蒐購工作又是如何展開？蘇精在「抗戰時期秘密蒐購淪陷區古籍始末」一文中，有詳實而生動的描繪：^[5]

抗戰軍興，兵燹之餘，藏書家深覺難以繼續經營存藏的古籍，有些藏書家的後代也無意於保留先人圖書，於是紛紛求售維生。而日方、偽滿及尚未被戰爭波及的美國各大學，都派人挾款大量收購。……連北平的書賈也先後南下收購，轉運北方出售，利之所在，不僅善本而已，即普通刻本也在網羅之列，以致中華典籍一時頗有盡淪異域之虞。

一些陷留在上海的學人對此種現象感到憂心忡忡，深恐江南典籍自此而盡，後代子孫將無書可讀，或需遠涉異國以求中華文化，後果堪憂。……紛紛寫信至重慶各有關的部門，建議政府設法保存。

重慶國民政府獲知這些古籍的存續堪虞，由國民黨組織部長朱家驊出面安排，因朱家驊另兼中英庚款董事會的董事長，遂將庚款董事會原訂補助中央圖書館興建館舍的費用轉為蒐購淪陷區散出的古籍，並由中央圖書館與淪陷區學人合作進行蒐購工作。

這一項蒐購要務之所以由在重慶的中央圖書館肩任其事也有其淵源，因為中央圖書館成立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肩負起「保存文獻」的重任。在民國17年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中，即曾經針對「籌設國立中央圖書館」此一議案有所期許：^[6]

近來外人重視東方文化，來華之收買古籍者接踵而至，致奇書秘籍流於異域；國人之講國故者，竟有求諸國外圖書館事，可謂奇耻大辱；此種保存文獻之重任，不得不屬望於強有力之中央圖書館。

民國22年，中央圖書館籌備成立，館務伊始即以「積極蒐訪典籍，以免國家文獻淪亡海外」自期，之後遂與「同志會」共同進行此一文獻搜求的偉業。

當時散出的古籍分別集中在上海以及香港兩大書市。上海方面的蒐購工作由暨南大學校長何炳松、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暨南大學文學院長鄭振鐸等負責，何炳松管理經費、張壽鏞審訂版本，而鄭振鐸和藏家及書商連繫並擔任聯絡重慶

^[5] 蘇精著，《近代藏書三十家》（臺北：傳記文學，1983），頁223-236。

^[6] 同註2，頁58-59。

的窗口；香港方面則悉由葉恭綽負責；民國29年中，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長徐鴻寶又由重慶到上海協助，以上諸位在淪陷區中秘密進行蒐購工作，而蔣復璁館長則在後方籌措經費，布置一切。

在淪陷區從事古籍蒐購需時刻防範敵僞的眼目，蔣復璁館長曾在民國29年由重慶潛赴香港和上海進行初步連絡，他的行蹤一度被日方偵知，幸而脫險，平安返渝。^[7]而鄭振鐸在上海奔訪書肆洽購古籍時，也曾被日本密探多方查訪，他甚至在這段期間中有家都不敢歸。^[8]

搜訪之初由中英庚款提供40萬元經費，其中部份是墊款、部份是補助款，得此經費，一時間購入不少古籍。然而三數月間經費即將用罄，以致上海購書頗有無米之炊的遺憾，而待購的古籍仍源源不絕，在蔣復璁館長的爭取下，教育部和中英庚款董事會都繼續支持，當時曾由教育部提案，經行政院院會通過增撥經費80萬元，有此挹注，嘉業堂藏書方順利購入。至民國30年欲購適園藏書時，金額更高，而且賣方一日數變，上海、重慶頻頻連繫，惟恐生變，當然雖然已由教育部轉報行政院儘速撥款，但尚待核准。為爭取時效，蔣復璁館長再商請中英庚款董事會墊撥70萬元，即時購入適園藏書。兩年間先後由中英庚款董事會和國民政府撥款一百八十餘萬，購入善本古籍近五千部、普通古籍逾一萬部，計約十六萬冊典籍。^[9]

(二) 蒐購的對象

在短短的兩年間即買入近16萬冊的各類古籍，而且善本古籍部分皆需審慎的評估或篩選，當時工作的繁重可以想見；在上海購書的機會經常是稍縱即逝，必須把握得當，其壓力也可知，但如此辛苦究竟有其代價。買入的古籍多是著名的藏書家和舊書肆的精品，由於藏書家的書藏乃經年累月所蓄，必有其特色，而書商則不免零零星星，並且有居奇的生意心態，所以當時的蒐購重點首先在江南的若干藏家，之後才與書商接觸。

經鄭振鐸的連繫，往來的藏書家包括：^[10]

^[7] 同註5，頁225。

^[8] 同註5，頁183。

^[9] 同註5，頁236。

^[10] 盧錦堂，〈屈故館長翼鵬先生與國立中央圖書館在抗戰時期所蒐購我國東南淪陷區之古籍最精品〉，載於：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國家圖書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屈萬里先生百歲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家圖書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7），頁5。

1. 蘇州劉世珩玉海堂及其子劉元泗，
2. 吳興張蔥玉（註：名珩）韞輝齋，
3. 常熟瞿鏞鐵琴銅劍樓及後嗣瞿鳳起，
4. 廬江劉晦之遠碧樓，
5. 江寧鄧邦述群碧樓，
6. 吳縣王蔭嘉二十八宿硯齋，
7. 武進陶湘涉園，
8. 武進費念慈，
9. 順德鄧秋枚風雨樓，
10. 嘉興沈曾植海日樓，
11. 南陵徐乃昌積學齋，
12. 海鹽張元濟，
13. 吳興劉承幹嘉業堂，
14. 吳興張鈞衡適園及子張芹伯（註：名乃熊）

而相與交易的書肆商賈包括上海及平津各地，如：^[11]

1. 孫伯淵，
2. 中國書店，
3. 傳薪書店，
4. 蟬隱廬，
5. 富晉書社，
6. 來青閣，
7. 忠厚書莊，
8. 修文堂，
9. 修綆堂，
10. 文殿閣，
11. 文祿堂，
12. 邃雅齋，
13. 來薰閣。

本來江南藏書散出，不但國外、敵僞都亟思購去，連平津書賈也加入出價，甚至加碼哄抬。但是經過同志會的努力和鄭振鐸的奔走，並曉以國家大義，結果

^[11] 同註10，頁6。

不但大多數的藏書家願意先將書賣給國家，甚至書賈們也自知既然不足與同志會相匹敵，乾脆提供精品求售。一時之間不僅阻止了「南書北運」，進而再使「北書南流」。^[12]鄭振鐸曾經發出豪語說：^[13]

偽滿的人在購書，敵人在購書，陳群、梁鴻志在購書，但我所要的東西決不會跑到他們那裡去。

事實證明，他確實做到了。

(三) 蒐購的重點

鄭振鐸負責與這些藏書家和書賈往來接觸、鑑定議價，箇中滋味甘苦參半，他說：^[14]

雖斷斷論價事極瑣屑，鑒別版本頗費辛苦，而取十於千百，一旦獲有精品或孤本，便足償數日乃至數月之辛勞而有餘。

購書的來源雖多，但最重要的是「二張二劉一鄧」，二張指的是張氏適園、張蔥玉韞輝齋；二劉指的是劉承幹嘉業堂、劉晦之遠碧樓；而一鄧則是鄧邦述群碧樓，其中又以劉承幹嘉業堂和張氏適園兩大書藏最稱美富，報告書中提到嘉業堂書藏的重要，說：^[15]

劉（承幹）貨……精品可有三千五百種左右，可抵過北平圖書館之四冊「善本日」。

又稱張氏適園所藏：^[16]

僅黃蕘圃校跋之書已近百部，可謂大觀。

同志會借得葉恭綽在上海所蓋「法寶館」作為整理的場所，雖可避人耳目，但只有館中二樓半間，十分侷促。鄭振鐸雇請人手在此處將各處購入書籍加以編目裝箱，再分運他處妥為藏匿。至民國29年底，屯積的古籍越來越多，形成了保管上的困難，而上海隨著戰爭的發展，環境日益險惡，經過重慶、上海和香港三地一再考量，終於決定將上海所購古籍透過香港轉運內陸。第一批內運古籍由在上海協助的徐鴻寶親自攜帶兩大箱精選古籍由滬飛港，再交航空公司轉運重慶，

^[12] 盧錦堂，〈抗戰期間中央圖書館搶救我國東南淪陷區散出古籍相關工作報告書之一考察〉，載於：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第一屆東亞漢文文獻整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尚未出版（臺北：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2008），頁75。

^[13] 房鑫亮，《忠信篤敬一：何炳松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頁160-161。

^[14] 同註2，頁78。

^[15] 同註2，頁88。

^[16] 同註2，頁82。

這一批82種精品善本輾轉於民國30年9月安抵重慶；第二批二千餘部古籍則以包裹寄港，並由葉恭綽暫時存放於馮平山圖書館，等候轉運內地或運美寄存。

嘉業堂以及適園兩批善本精品購入後，同志會的蒐購工作已近尾聲。民國30年12月5日鄭振鐸致張壽鏞最後一封古籍蒐購的信說：^[17]

芹（張芹伯）貨宋元本部分，已整理就民國緒。……

31年間，上海一片蕭條，4月16日鄭振鐸致蔣復璁信說：^[18]

日游書肆，一無所見。

次年（民國32年）5月，吳縣潘博山遽逝，先祖潘祖蔭滂嘉齋及潘博山寶禮堂所藏宋元版散出，索價50萬美金，折合當時國幣20億，鄭振鐸函告蔣復璁建議籌款購入。但由於政府財力困難而作罷，這是鄭振鐸在淪陷區為本館蒐購古籍的最後努力。

自民國29年初到民國30年底兩年間同志會的作為中，舉凡對藏家書賈的接洽、經費的分配使用、書籍的品評鑑定、購入後的整理編目，鄭振鐸幾乎無役不與。在這二年之間，鄭振鐸寫給張壽鏞的信多達270封，而寄給蔣復璁的信也有70封，包括交待詳盡的九份工作報告在內。無論在信函或報告中，鄭振鐸不但忠實記錄了當時的蒐購細節，並且盡情表達他對建立國家書藏的宏觀卓識；此外，他更不時以熱情澎湃的口吻抒發他對蒐購工作的熱愛及奉獻。60年前的舊事，雖已時過境遷，但今日讀來，當時購書的危急、蒐購的艱辛仍躍然紙上，而鄭振鐸為此事既奔忙冒險，又竭智盡力，且未支分酬，堪稱是「文獻的衛士」。^[19]

三、蒐購目標及購書方式

(一) 蒐購目標

鄭振鐸深知購書宜有明確的目標才能建立特色，尤其在經費不甚寬裕的情形下。從鄭振鐸寫給蔣復璁、張壽鏞的信件及報告書中，曾多次提到「購書目標」，而且隨著蒐購的進行也有調整。鄭振鐸不但訂下了明確的購書目標，並且是把它放在一個具有遠見的架構之下，也就是他要藉著這些目標的達成，為當時籌備成立不久的中央圖書館，建立一個可長可久的書藏基礎。他曾經表示：^[20]

^[17] 同註4，頁283。

^[18] 沈津，〈鄭振鐸致蔣復璁信札（中）〉，《文獻》，2001：4（2001.10），頁225。

^[19] 同註5，頁181。

^[20] 同註4，頁129-130。

敝意爲中央圖書館購書，應務其遠者、大者，不能以小規模之普通圖書館爲滿足。對於中文部分，至少須有五六百萬冊，始可應有儘有，細大不捐。（若倫敦博物院之例）且不僅求備，亦應求精。蓋國家圖書館原有保存國寶之義務與責任也。我輩工作，方在創始。將來續款到齊時，不妨放大眼光，多購奇書、罕見書。我輩與敵爭文化遺物之目的，原亦在此。至《書目答問》中物，如購齊，價亦不多，儘可有餘力從事於此保存工作也。近來古書益罕、益昂。將來之患，不在於缺款購書，恐將在於無書可購也。我之工作，近全在邀致書賈們爲我輩收書；俾好書不漏失，此項工作已有相當成績。然已費九牛二虎之力矣！我輩收書，固不可浪費；然亦不宜過刻。蓋刻則將無書可見矣。

上面這段話對於蒐購的目標及作法兼而論及，在「目標」方面，「應務其遠大；不僅求備，亦應求精；放大眼光，多購奇書、罕見書。」在「作法」方面，「邀致書賈收書，收書不宜過刻。」可見鄭振鐸購書，既有深謀，更有遠慮。

鄭振鐸進行蒐購不久，在瞭解公私散出古書的大略後，即勾勒出一個他心中的購書目標，包括以下幾項：^[21]

1. 普通應用書籍，
2. 明末以來「史料」，
3. 明清未刊稿本，
4. 方志、家譜，
5. 《四庫全書》相關著述，
6. 有流落國外危險的重要文獻及著作。

上述1.普通應用書籍，包括：十三經注疏、二十四史、九通、清人別集及近百年來刊行叢書；2.明末以來史料，包括明末文獻及清鴉片戰爭之後史料；4.方志中特重有關宗教教育之「書院志」及「山志」。另鄭振鐸特加強調《四庫全書》相關著述，實寓有深意，他說：^[22]

我輩有一私願，頗想多收四庫存目及未收諸書。於四庫所已收者，則凡足以發館臣刪改塗抹之覆者，亦均擬收取之。……館臣於宋元及明代之「史料」及文集，刈夷尤烈，塗抹最甚。乾嘉之佞宋尊元，斷斷於一字一筆之校勘

^[21] 同註2，頁79。

^[22] 同註2，頁79。

者，未始非苦心孤詣，欲保全民族文化于一線也。然所校者究竟不甚多，且亦多亡佚。恢復古書面目，還我民族文化之真相，此正其時。故我輩於明抄、明刊及清儒校本之與四庫本不同者，尤為著意訪求。

此外，從鄭振鐸對於為什麼要收《四庫全書》相關著述及打算收那些相關著述，可知他不但不是一個緊抓著四庫外在的盛名而一味抱殘守缺的人，反倒是他對《四庫全書》的編纂用意及其對中國文化的負面影響有著深刻的認識，他之所以搜求這方面的書顯然，是要還原歷史及文化本來面目的用意，若從這個角度來看，則鄭振鐸所收的這些書，對於文化史的研究大有助益，而館藏這批材料足可提供這方面的研究。至於四庫的相關著述有那些？鄭振鐸認為應該包括：^[23]

1. 「四庫」著錄各書之乾隆以前刊本、抄校本及乾嘉以來與「四庫」本不同之抄校本，
2. 「四庫」存目各書，
3. 「四庫」未收書：甲、乾隆以前著述，乙、乾隆以後著述，
4. 禁書目錄所著錄各書。

由此可知，單單就「四庫」相關著述一項，即範圍廣泛，包羅衆有。

之後，徐鴻寶來上海，鄭振鐸與他共商後，稍稍調整購書目標，除以上各項外，另增：(一)孤本、(二)極罕見本兩項，而將普通的宋元本以及習見易得的明刊本刪去不購，另把「史料」當成購買的重點。^[24]在這些諸多的購書目標中，「史料」及「稿本」是鄭振鐸相當重視的兩項文獻。他之所以重視這兩項文獻，當由於都是作學問的基本材料，而適當地運用這些材料必能建構出新知識，鄭振鐸說：^[25]

取劉、張二目細閱，覺張物佳品固多，下駟亦不少。劉物則多史料、稿本，甚合保存「文獻」之目的。即全捨其宋元而取其明刊、抄校亦甚可觀。我輩所得，有數大特色：

1. 抄校本多而精，
2. 史料多，且較專門，如得劉物，則欲纂輯「明史長編」，必可成功。
3. 唐詩多，且頗精，並世藏家，恐無足匹敵者。如再得蜀刻及書棚本唐集十餘種，明活字本唐集五六十種（近有六十種左右可得），則重編「全唐

^[23] 同註4，頁123。

^[24] 同註2，頁88。

^[25] 同註4，頁187。

詩」之工作，亦大可進行矣。

得書不易，應用尤難。我輩如能在短時期內，儘量應用所得書則誠不虛此書購置之苦心矣。

由這段話可知，鄭振鐸不是在「購書」，而是在「蒐書」，他在蒐購的同時，已經為這些史料文獻預先設想到日後的運用。^[26]

(二) 國家書藏的建立原則

「質與量」、「實用及保存」是鄭振鐸購書的兩大綱領，他曾在給張壽鏞的信中說：^[27]

我輩收書，不重外表，不重古董，亦不在飾架壯觀，惟以實用及保存文化為主。

對於建立國家書藏，實用書固然必需，但宋元古版究竟要不要收？鄭振鐸也提出他的看法：^[28]

國家圖書館之收藏，與普通圖書館不同，不僅須在量上包羅萬有，以多為勝，且須在質上足成為國際觀瞻之目標。百川皆朝宗於海，言版本者必當歸依於國立圖書館。凡可稱為國寶者，必當集中於此，蓋其性質原是博物院之同流也。

所以，鄭振鐸認為「質」與「量」當是建立國家書藏的兩大要素。如此，方能「成為國際觀瞻之目標」，揆諸今日本館所儲特藏，深符他的遠見。

鄭振鐸曾經專為購入的古籍代刻過幾枚藏書章，其中一枚即是「不薄今人愛古人」，從印文也顯示出當時他購書的原則之一，此一原則既矯正藏書家「薄今

^[26] 鄭振鐸30年1月17日致張壽鏞信中即對「明史長編」的編纂有初步看法，信中云：「『明史長編』擬分數『部門』編纂，一為『列傳』之部，擬以《焦氏獻徵錄》及各明人集為根據，先成一明碑傳集，此或簡而易舉者。所借北平圖書館之書，未能利用，大是減色耳。一為〈本紀〉之部，則擬印《明實錄》及《明寶訓》、《大誥》等。一為表志之部，亦可搜羅明人各著作，如《國朝列卿年表》、《馬政紀》、《廠庫須知》等為之。至關於『倭』『遼』諸役，則彙集各書為之，其體類《紀書本末》，亦類《四夷傳》，殆是創舉也。」（劉哲民、陳政文，1992，頁187-188）信中所舉《焦氏獻徵錄》、《馬政記》等書都係劉、張兩家藏書。

^[27] 鄭振鐸這一段話的前一段是：「前者，菊老（註：張元濟）曾赴港一行，歸來時，傳達玉老（註：徐鴻寶）意，為最好多購實用書，此固『人同此心』者。」接著，鄭振鐸就寫出他「不以為然」的看法而有下面這一段話。所以，鄭振鐸應當是反對因買「實用書」而忽略了購藏重要的古刻。

^[28] 同註2，頁83。

愛古」的偏弊，也避免因此而走入「厚古愛今」的歧路。^[29]

以上述原則（或標準）來蒐購古籍，不到一年半間，所得到的成果令人滿意，鄭振鐸即自認：^[30]

不僅善本頗為可觀，即普通應用圖書亦已略見充實。

其後鄭振鐸所購嘉業堂及適園這二批要藏，更以上述原則為據，他品評兩家藏書的內容後表示：^[31]

（張芹伯）精於鑑別，所收大抵皆上乘之品，不若石銘（註：張鈞衡字石銘，即張芹伯的伯父）之泛濫、誤收，故適園舊藏，或有中駟雜於其中，而芹伯新收者，例皆為宋、元本抄校本之白眉。……嘉業堂藏書……普通參考書幾於應有盡有，作為一大規模圖書館之基礎，極為合宜。其中宋元明刊本及抄校本、稿本，約在四分之一以上。其精華在明刊本及稿本，明刊本中尤以「史料」及「方志」為最好。明人集部亦佳，……以此補足「善本」目（註：即同志會為所購古籍所編的善本目錄），誠洋洋大觀也。加之以芹伯所藏，已足匹儷北平圖書館之藏而無媿色。

鄭振鐸念茲在茲就是要為當時的中央圖書館建立起一個既「符合國立圖書館書藏」而又「成為國際觀瞻所繫」的國家書藏。他身在淪陷區蒐購江南藏書，但心目中是以北平圖書館作為建立他理想書藏的對手。國立北平圖書館的前身是京師圖書館，承繼了中國歷朝所遞藏的善本古籍，又從各方廣為蒐集，所藏古籍比起當時甫成立的中央圖書館勝出倍蓰不止，若非鄭振鐸為中央圖書館所訂建立國家書藏的藍圖和具體的購書目標，本館難有今日富麗的善本特藏。

（三）購書方式

求書、購書對鄭振鐸來說絕非難事，他既愛書、又懂書，並且更讀書，這和一般嗜古佞宋的藏書家將善本當作古董看待截然不同。鄭振鐸學通中西，又身遭新舊時代的交替，他用心研究國故，並且勤於創作新文學。^[32]在抗戰前，鄭振鐸既擔任大學教席，又進行舊文學整理、刊物編輯和文學創作等多項工作，這幾項工作無一不和圖書有關。因為需要，他逐漸建立起個人藏書，蘇精所撰《近代藏

^[29] 蘇精寫〈葉德輝觀古堂〉說：「葉德輝……一再批評藏書家『薄今愛古』的偏弊，他自己注重一書版本內容的好壞，遠過於講求版本新舊，因此他對於張之洞『書目答問』以清代刊本為主，而不列宋元舊刻的作法，頗為推崇，……。」（蘇精，民72，頁39）

^[30] 同註2，頁70。

^[31] 同註2，頁82。

^[32] 同註5，頁173-174。

書三十家》中，即將「鄭振鐸玄覽堂」列為其一。由以下蘇精書中所舉的這兩個例子可知鄭振鐸對書的偏愛和融入：^[33]

民國二十一年他（註：鄭振鐸）任教燕京大學時，曾在該校天和廠一號的住所，舉行「北西廂記展覽會」，公開展出他收藏的二十一種《西廂記》版本（明刊十一種、清刊十種），……這個別開生面的專題展覽引起學界一陣矚目，鄭振鐸倒非藉此出風頭，而是提倡文學史的研究應重視版本，才能顯示古人作品的真面目，免受歷來好事刪改者的愚弄而自誤誤人。

鄭振鐸對同一小說的廣羅異本，可以《水滸傳》（不含水滸的續書為例，在《西諦書目》中，從最早的明嘉靖朝到民國以後共是二十一種版本）……其他如《列國志》、《三國演義》、《西遊記》、《紅樓夢》等等，無不如此。

抗戰期間驅動鄭振鐸蒐購古籍的動力不再為一己之學，而更有「保存國家文獻，與敵爭文物」的信念在內。^[34]由於長期蒐書、購書，他早已累積了許多圖書交易的經驗，在這一次蒐購古籍的過程中，他既施展了高明的購書手腕，也從買不到的失望和遺憾中學到不少東西。

鄭振鐸洞察書賈轉手哄抬書價的惡習，多直接從藏家著手。對於不合理的書價，他也有巧妙的應對方法，他說^[35]

書價日昂……。現直接向各藏家及較小之肆購買為主，且出價極力抑低，俾能維持去歲之標準，同時又不願失去好書。對於索價較高者，常暫時保存，不與結帳。竟有時能發現索價較低之第二部，而將第一部退還。

在寫給張壽鏞的信中，鄭振鐸提到更多和書商打交道的細節，像是民國29年2月23日函：^[36]

……近有一批書，可成交，近八十箱。當囑以不可散售，要全部留下。……何先生（註：何炳松）極主購整批書，此亦一機會也。我輩訪購，必須先有見到新出書籍之機會，然後方可選擇其精者。現已逐漸可使江南一帶所出古書，必須先經我輩閱過，然後再售。然做到此地步，所費時力，已是不少矣。一二月後必可辦到全部好書不致漏失，且使平賈問津無從也。……

^[33] 同註5，頁176-178。

^[34] 同註2，頁74-76。

^[35] 同註2，頁90。

^[36] 同註4，頁11。

民國30年6月16日函：^[37]

劉晦之書已爲平賈王晉卿購去。……我輩遲了一步，便成終生之憾！現已設法，不知能留下幾種否？（聞未全去）今日購書，必須眼快手快，蓋競爭者殊多也！辦事之難，於此可見。

民國30年8月19日函：^[38]

近日連遭失敗，心中至爲憤懣。……終夜徬徨，深覺未能盡責，對不住國家！思之，殊覺難堪！殊覺灰心！反省我輩失敗之原因，一在對市價估計太低，每以爲此種價錢，無人肯出，而不知近來市面上之書價，實在飛漲得極多極快，囤貨者之流，一萬二萬付出，直不算一會事。而我輩每每堅持低價，不易成交，反爲囤貨者造成絕好之還價機會。誠堪痛心！二在我輩購書，每不能當機立斷，不能眼明手快。每每遲疑不決。而不知，每在此千鈞一髮之際，便爲賈人輩所奪矣！亦緣我輩不敢過於負責之故。往者已矣，不必再談矣！談之，徒惹傷心！將來，當有以自警、自勵矣！

民國29年鄭振鐸在淪陷區著手蒐購古籍不久，就訂下了「二劉二張」的購書目標。^[39]而嘉業堂及張芹伯這二家更是他意在必得，所以之後收書都先核對二家書目，二家已有的一概不收，鄭振鐸寫道：^[40]

此刻對於收購宋元明刊本，皆參考嘉業堂及張芹伯二家書目，於此二目所有者，皆摒棄不收。（惜此二目最近方取得，已收有若干種重複者矣。）蓋預計此二「藏」於最近將來或可獲得。普通書不妨重覆，此類善本則不宜多儲複本。而於二家目所未收而確有保藏價值之明代精刻本，則亦儘量之。於普通習見之明本，則持極慎重之態度；對於價昂而無甚意義者，往往棄去。

所以鄭振鐸採取「先核對藏家書目」，並且「區分購藏的優先順序」，這些作法既可擲節經費，又可事半功倍。

四、嘉業堂及張芹伯藏書的購入

（一）兩批藏書的重要

在鄭振鐸的心目中，嘉業堂和張芹伯兩批藏書佔有舉足輕重的份量，他致函

^[37] 同註4，頁236。

^[38] 同註4，頁256。

^[39] 同註2，頁76。

^[40] 同註2，頁79。

張壽鏞說：^[41]

嘉業堂及張芹伯二處必須儘快設法，此數月中誠江南文化之生死存亡關頭也。

當時是民國24年4月底，之後鄭振鐸曾在報告書中歷數江南的重要書藏，包括：瞿鳳起、嘉業堂、張芹伯、張蔥玉、劉晦之、徐積餘（名乃昌）及袁伯夔諸家，而其中尤以張芹伯和嘉業堂最是各擅勝場，他認為：^[42]

……其中以張芹伯書為最精，僅黃跋本已有九十餘種。……嘉業所藏善本多半在滬，多而不甚精，其中明刊本一千八百種以上，實大觀也，其重要實在其所藏宋元本之上。……

當時不祇是同志會，各方多覬覦這兩批藏書。就因為其重要，所以鄭振鐸頗擔心「夜長夢多」^[43]，以至於在他所寫的諸多信函和報告書中，屢屢提到劉、張這兩批藏書的內容價值、交涉過程及購書變化。縱使其他整批或零購進來的書再多、再好，鄭振鐸懸念不忘的仍然是這兩批書，他表示：^[44]

然我輩心目中，仍以能獲得劉、張二「藏」為鵠的。劉、張二目，經逐日翻檢，愈覺其美備。張氏之書，在版本書上講，瞿、楊（按：瞿鏞鐵琴銅劍樓及楊紹和海源閣，南北瞿楊並稱）之同流也，無數重要之宋元本及舊鈔本，若以今日市價核計之，其價須在十萬左右。若零星購取，恐尤不止此數，萬不能任其零星散失或外流。至劉氏書，則其精華全在明刊本，史籍尤多罕見之孤本，其中清儒手稿，亦多未刊者，實亦不能以市價衡之。……

民國30年5月劉書成交，共選取明刊本一千二百餘種，鈔校本三十餘種。^[45]有關嘉業堂購書內容，鄭振鐸描述道：「明刊本中，多為可遇而不可求之物！史、集二部，尤為白眉。明刊本中，以史料書最為難得，最可矜貴；集部中難得之精品亦不在少數，明刊本明人別集，約近四百種，皆極有用。其他子部，亦多奇書異品。」^[46]民國30年11月張書成交，從11月1日開始清點其中的黃跋本，到12月初才全數點收完畢，歷時逾一月。^[47]雙方成交內容是以《蕙圃藏書目錄》為

^[41] 同註4，頁76。

^[42] 同註2，頁76。

^[43] 同註2，頁80。

^[44] 同註2，頁85-86。

^[45] 同註2，頁91。

^[46] 同註2，頁91。

^[47] 同註4，頁276、282。

據，而將其中的清版書、普通書及吳興人著述除外，共約一千二百餘種。

從民國29年4月底到民國30年12月初，前後歷時一年半，劉、張兩批藏書相繼購入。當張芹伯的書快要點收完畢時，鄭振鐸寫信給蔣復璁分享他的心情，說：^[48]

芹貨點收，將次完竣，佳品繽紛，應接不暇。靜夜孤燈，披卷相對，別有一種異香溢出冊外，誠足自喜自慰矣。

(二) 嘉業堂書藏的洽購

嘉業堂書自接洽到購入，費時逾年，張芹伯書則更多費了半年。爲什麼這兩批書所花的時間和精力比其他購書多的多？購買的過程究竟有什麼困難？而這些困難又是如何克服的？鄭振鐸在他的書信和報告書中都不厭其詳的娓娓道來。

前文已提到這兩批書各有其精妙處，鄭振鐸最初的目標仍是整批購入，若當時果真兩批書都兼容並蓄的話，則其總數多達一萬四千餘部，不但使得中央圖書館得以根據嘉業堂藏書「作爲一大規模圖書館之基礎，極爲合宜」，並且「宋版書或可有二百（按：種）之可能」。^[49]但整批購入需費不貲，嘉業堂存在滬上的書索價80萬，張芹伯書開價50萬（或美金3萬），後來又漲至75萬，雖經削價仍遠超過當時購書預算，以至於雙方討價還價，此來彼往，牽延時日；再者，當時僞滿、平津書賈和其他多方都屬意這兩批藏書，也增加了購書的複雜度；第三，兩位書主即劉承幹和張乃熊，在鄭振鐸的描述中，都是善變之人。^[50]綜合以上三點因素，洽購劉、張這兩批藏書，誠可謂「好事多磨」。

最後這兩批藏書終能順利購入，原因固然很多，但是各有其關鍵的決定因素。對於嘉業堂藏書，買賣雙方想了一個「兩全」之計，一方面應付日僞的壓求，而另一方面則由國家收購藏品中的精華，鄭振鐸說：^[51]

後經再三商談，思得一「兩全」之計，即將嘉業所藏分爲三批，第三批爲普通清刊本、明刊複本及宋元本之下駟，我輩認爲可以不必購置，即失去，亦

^[48] 同註18，頁217。

^[49] 嘉業堂藏書總數12,450部，另《荊圃藏書目錄》1,800部，合共14,200餘部。鄭振鐸對嘉業堂藏書的看法見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編輯委員會，民72，頁82。鄭振鐸等於民國29年7月20日致蔣復璁函（沈津，2001，頁258），稱「如能並得張芹柏、嘉業堂之所藏，則宋版書或可有『二百』之可能也。」

^[50] 同註4，頁214。「劉事反覆無常，變幻百出，昨日幾生意外。」同註4，頁267。「芹方如此反覆無常，言而無信，……。」

^[51] 同註2，頁82。

無妨「文獻」保存之本意者，留作時局平定時成交，即萬不得已為某方所得，亦不甚可惜。第一批為我輩認為應亟需保存，且足補充已購諸家之未備者，即一部份宋元本、明刊罕見本、清刊罕見本、全部稿本、一部份批校本、此一批正在選揀中，俟全部閱定後，即可另編一目，按「目」點交。第二批為次要之宋、元、明刊本及一部分批校本、卷帙繁多之清刊本等。……如此將嘉業堂書析為上、中、下三品，而能以有限的經費選購藏品中的精華，同時解決日偽對嘉業堂的需索，確可「兩全」。即便如此，但書主對於售出的內容以及價格仍一再地反覆改易，幸而鄭振鐸堅持明刊本，包括叢書、方志及別集在內，一部都不能少，並且在書價方面從守勢改為攻勢，不再任由書主哄抬，而主動提出40萬、30萬及20萬5千元三種方案，惟三者選書內容不同，最後終以20萬5千5百元（5百元為佣金）取得嘉業堂明刊一千二百餘種及鈔校本36種。^[52]鄭振鐸說從民國30年4月初到4月中「劉事反覆無常，變幻百出，（昨日）幾生意外。」^[53]他並形容這項交易是「以一髮懸千鈞，少縱即逝。」^[54]鄭振鐸堅持「明刊本不得少」的蒐購策略對本館館藏有相當重要的影響，蘇精即認為：^[55]

中央圖書館館藏中不僅是空前，極可能也是絕後的特色之一，便是以嘉業堂這批獨步古今的善本為主所形成的明代史料。而當時同志會諸人之寧取明刊本、棄其宋元本於不顧，實不能不令人欽佩他們獨到的眼光與果斷的決定。

(三) 張芹伯書藏的洽購

張芹伯所藏善本約1,200種，其中宋刊元槧有160部，明刊400部，餘為鈔校本及稿本，其勝處不僅在黃跋本超過百部，其他宋、元本及鈔校本也都是上品。由於書主出價高至75萬元，比嘉業堂的20萬5千餘元，多過三倍有餘，所以就如何購入張芹伯書，也曾想過像嘉業堂書一般分批選購，但最後鄭振鐸仍向張壽鏞主張全數購入，他說：^[56]

芹貨以全購為妥，且可較廉，否則，分批購之，又須重行商議，殊為麻煩，且必不得便宜也。

[52] 同註2，頁91。

[53] 同註2，頁91。

[54] 同註2，頁91。

[55] 同註5，頁230。

[56] 同註4，頁259。

購買張芹伯書其間的變化，並不亞於嘉業堂，由於張芹伯索價一直以「3萬美金」為標準，但當時的國幣不斷在貶值，以至於「3萬美金」隨著時間換算成國幣是節節上漲；此外，在鄭振鐸的信中對張芹伯的印象也是「反覆無常」，他說：^[57]

……。昨晤張蕙玉（註：名珩，父乃驊是張鈞衡的四子，張芹伯名乃熊，是張鈞衡長子）。據云：芹為人至為反覆無常，非俟款到後面談，立即解決不可。否則，事前多談，彼此多猶豫，且貨價亦必恍惚不定也。……

重慶方面雖支持「全購」，但70萬國幣的匯款並不順利，正當此時又有「第三者」介入到這件買賣，令鄭振鐸頗感焦慮，他說：^[58]

……。聞芹書有某方面之接洽說，時刻有變化發生。……如芹貨竟為某方所奪，關係非淺！且我輩又將為某作「嫁衣裳」矣！凡貨最怕商談接近時，有人插入競購，不僅變化莫測，且價亦必將擡高也。

同樣在此「一髮懸千鈞」時，鄭振鐸為免功虧一匱而與張芹伯當面磋商，共同議定簽寫一個「合同」，並且先付訂金10萬，以免張芹伯反悔而前功盡棄。合同由希古堂（即文獻保存同志會的代稱）和張芹伯共同署名，述明餘款在一個月（後延長為一個半月）內付清；並自簽約日起依目錄檢理藏書，書款付清即將全部藏書點交接收；若未依約付清書款，另共同商訂估價及付書若干種的辦法。^[59] 這個合同訂得很公允，甲乙雙方的權益都兼顧到了，並且把握在最好的時機，也讓鄭振鐸為這批書焦灼了好幾個月之後終能放下心來。

五、蒐購成果

(一) 質量均佳

民國30年1月，蒐購工作甫告一年就相當有收穫，根據鄭振鐸的統計，包括宋元明刊、未刊稿本和鈔校本在內的甲類善本共二千零五十餘部；另外包括普通明刊和清刊精本的乙類善本也有一千餘部，一共是三千餘部。^[60]到民國30年4月間，嘉業堂書指日可待，而洽購張芹伯書也在積極佈局中，這時候鄭振鐸說：^[61]

^[57] 同註4，頁265。

^[58] 同註4，頁269

^[59] 同註18，頁226。

^[60] 同註2，頁90。

^[61] 同註2，頁90。

大抵我輩所得，不僅善本頗為可觀，即普通應用書亦略見充實。

民國30年之後5月購入嘉業堂書明刊一千二百餘部、鈔校本30餘部；再到民國30年12月收進張芹伯書善本一千二百餘部，另普通書300部，連同前述統計，而零星買入的不計在內，則總數已經高達五千七百餘部。^[62]這祇是就「量」而言；若從「質」來說的話，那內容的豐富以及版本的精純更不在話下。

嘉業堂書購入後，上海局勢日漸危急，經滬、渝、港三地商議，決定請由渝到滬協助蒐購古籍的徐鴻寶，於民國30年7月間親自護送80種精品由滬舶運到港，再輾轉交航空後運到重慶。中央圖書館曾在重慶將這80種精品公開展覽，參觀者絡繹不絕，頗有提振大後方士氣的效果。^[63]由於張芹伯書直到民國30年底才購入，所以這80部精品中並不包括張書在內。

(二) 內容闕富

在上海蒐購到的古書既多且精，鄭振鐸致中英庚款基金會的九次報告書中雖然多所著墨，但係在不同時間針對不同來源分別述其大要，不容易看出一個整體面貌，以下就這些古籍分為若干要項逐一說明，藉知上海購書的佳勝之處。

1. 明代史料

蒐購所得明代史料主要仍集中在嘉業堂書，包括「史」、「集」二部，鄭振鐸在《同志會第八號工作報告書》中已擇要舉出，他並且表示：^[64]

明刊本中，以史料之書，最為難得，最可矜貴。擇其要者言之，則有：（按：以下列舉書名，從略）。此項史料皆極難得，即懸百金於市，恐亦不易得其三五種。……集部之中，難得之精品亦不在少數。……惟其精華所聚，畢竟在明人別集，此項明刊本明人別集，約近四百種，皆極有用，非若薄冊單帙之無關時代之詩集也。舉其要者，有：（按：以下列舉書名，從略）均皆輕易不能在坊肆中見到者。即偶一有之，亦不過月遇二三種，年遇二三十種耳。且更有市上絕不可得見者！即以十載、二十載之力，欲聚此，恐亦難能也。……

^[62] 數字比蘇精說的多。

^[63] 有關80種精品，蘇精和盧錦堂的計數不同，盧錦堂有清單，見註3。盧錦堂，〈屈故館長翼鵬先生與國立中央圖書館在抗戰時期所蒐購我國東南淪陷區之古籍最精品〉，載於：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國家圖書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屈萬里先生百歲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家圖書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7），頁85-91。

^[64] 同註2，頁92-93。

在史部方面，鄭振鐸曾選出40種書，擬編為《善本叢書》一至四集，包括：明代典章、地理邊防、宋明史料以及明代邊事等四部分^[65]，殆為《玄覽堂叢書·初輯》的前身，這40種書可以視作所購明代史料的代表作品。另選入前80種最精品中也包含若干部明人文集，如：王彝《媯雌子集》、高啓《槎軒集》、夏時《守黑齋遺稿》、金大車《金子有詩集》，除《守黑齋遺稿》（見圖一）為明初刊本，其他三部都是鈔本，相當罕見，而後三部更有黃丕烈的鈔補或題跋，更加珍貴。



圖一：《守黑齋遺稿》共十一卷2冊，(明)夏時撰。

明永樂十五年(1417)上虞葉氏刊正統五年(1440)補刊序跋本(藏品編號1241)。

2. 四庫相關著述

四庫相關著述包括四庫底本、存目及未收諸書；另凡與四庫本不同的明刊明鈔以及清儒校本也是購求重點。^[66]由於對蒐購四庫相關著述，鄭振鐸始終懷著一種「恢復古書面目，還我民族文化真相」的動機。^[67]所以收了不少這方面的書。他在同志會報告書及信函中都舉出不少相關的例子，像是：

近所得淡生堂抄本《樂全居士集》(見圖二)，即較四庫本多出極有關係之文

^[65] 同註2，頁95-96。

^[66] 同註2，頁79。

^[67] 同註2，頁79。

數篇，其間文字之異同，尚未遑計及。^[68]

元刊本《瑤瑤子三命消息賦》三冊（四庫本係從大典輯出，不全，鐵琴銅劍樓有舊鈔本。此猶是元刊元印本，最難得）。^[69]

風雨樓鄧秋枚氏所藏書，……其中明刊善本抄校本近二百種，（按：以下多列舉書名，從略）……。鄧氏以流佈民族文獻著名，所藏書中，「禁書」不少，實足以補充已購各批書中之未備者。^[70]

平肆邃雅齋……善本三百餘種郵寄敝處。經我輩仔細研究、選剔，擇其確是罕見秘籍或四庫存目之「底本」，今日不易得到者，收下八十餘種。……計得（按：以下列舉書名，間註明四庫底本，從略）……。^[71]

薛應旂《憲章錄》一部，絕佳，……此書絕罕見，所見都為不全者，此是天一閣舊藏，初印乾淨，雖為萬曆初年刊，實極可貴。此類史料書，為四庫所斥者（見四庫存目），我輩必須收下。^[72]



圖二：《樂全先生文集》存三十七卷，附行狀一卷13冊，
（宋）張方平撰。明山陰祁氏淡生堂藍格鈔本（館藏編號10131）。

[68] 同註2，頁79。

[69] 同註2，頁80。

[70] 同註2，頁81。

[71] 同註2，頁84-85。

[72] 同註4，頁10-11。

鄭振鐸所收四庫相關著述多係個人文集，但在他心目中這些文集具有「史料」的價值，是不能和一般文集相提並論。^[73]

3. 宋元版刻

同志會所收宋元本超過250部，其中宋本居半。本館現藏宋元本近450部，其中宋本175部，元本272部。兩相對照，即可知館藏宋元本，尤其是宋本，超過七成以上是鄭振鐸所購。這250部宋元本的來源以自張芹伯所得為最多，此外也包括張元濟和劉晦之兩位藏家，鄭振鐸曾就所購張元濟所藏宋元本中的精品加以評騭，他說：^[74]

……從張菊老處，得其藏書中之最精者五種：(一)唐寫本《文選》一巨卷，(二)宋寫本《太宗實錄》五冊，(三)宋刊本《山谷琴趣外編》一冊，(四)宋刊本《醉翁琴趣外編》一冊(殘)，(五)元刊本《王荊公詩注》十冊(李壁注，國內無藏全帙者)。此五書，皆可稱為壓卷之作。……得太宗實錄，史部得冠冕矣；得山谷醉翁琴趣二種，詞曲類可無敵於世矣；得《王荊公詩注》，元刊本部分足稱豪矣！……

鄭振鐸曾於民國29年10月間精選宋元本12部為「善本叢書」，計畫影印傳世，所擬選目包括以下諸書：^[75]

- (1) 《尚書注疏》 宋刊本(張)
- (2) 《韓詩外傳》 元刊本(張)
- (3) 《中興館閣錄、續錄》 宋刊本
- (4) 《續吳郡圖經》 宋刊本
- (5) 《新定續志》 宋刊本
- (6) 《李賀歌詩編》 北宋刊本(張)
- (7) 《豫章黃先生文集》 宋刊本(張)
- (8) 《滄浪吟》 元刊本
- (9) 《五臣注文選》(見圖三) 宋刊本
- (10) 《唐詩弘秀集》 宋刊本

^[73] 同註4，頁10-11。

^[74] 同註2，頁94。

^[75] 「善本叢書」只有擬目，實未印成，擬目內除了張書外，其餘是劉晦之藏書。

- (11) 《坡門酬唱》 宋刊本(張)
 (12) 《詩法源流》 元刊本(張)



圖三：《文選》共三十卷16冊，(南北朝)蕭統編。

宋紹興三十一年(1161)建陽崇化書坊陳八郎宅刊本(館藏編號13573)。

以上註明「(張)」字樣係指張芹。

伯藏書，雖然當時尚未購入，但已經被鄭振鐸列為日後實現的目標，其餘沒有註明的幾乎都是劉晦之所藏；此外，在準備這個「擬目」時，張元濟書還尚未買進，所以這12部書稱得上是那個時候他心目中的「國寶」。

鄭振鐸稱所購張芹伯藏的宋元版本，大半均為「銘心絕品」。^[76]此外，無論是從劉晦之或張芹伯購入的善本，許多都經過黃丕烈的校跋，更是精罕。

鄭振鐸蒐購宋元本的心態並非「希古佞宋」，前文已述，這些宋元刻本除了可供校讎後代傳本以外，其內容也具有文獻價值，例如購自張蕙玉(珩)的善本中有一部南宋坊刊《新編婚禮備用月老新書》，卷目包括：婚姻禮法、姓氏源流、婚書警聯、媒妁求親、聘定請期、親迎合歡等。屈萬里就認為此書是宋代重

^[76] 同註2，頁96。

要的社會史料，他說：^[77]

此在當時，雖為酬世之兔園冊子；而在今日視之，則饒有社會史料之價值，……可以考見宋時婚俗之實際情形，他書中無此豐富而切實之資料也。……是書既未聞有複本流傳，復未經後世翻刻，大抵天壤間唯此一本而已。

4. 鈔校本及稿本

前述鄭振鐸將嘉業堂書中的部分宋元明清刊本、批校本及稿本都分別出來作為選購的「上品」，直到最後成交時，除了明刊本一千二百餘部外，其餘就是這36種「鈔校本」，它們被鄭振鐸視為是嘉業堂批校本中的精華，鄭振鐸說：^[78]

鈔校本中，我輩所選取者，以明鈔本為最多，殆已竭其精英。計有：（按：以下列舉書名，從略）……。舊鈔本百中取一，未必甚佳，惟可資以補充未備，計有：（按：以下列舉書名，從略）……。批校本所取最少，然均為極矜貴之品，計有：（按：以下列舉書名，從略）……。

另在所取張芹伯書中，黃丕烈校跋書共有101種^[79]；所購鄧邦述書中，鈔校本既多且精；無論是鈔校者、或是批校者，都是有名的清儒，諸如：邵晉涵、孔繼涵、孫星衍、嚴可均、蔣西圃、鮑廷博、顧廣圻、葉廷甲、何焯、吳焯、錢曾、勞格、秦恩復、繆荃孫、惠棟、吳騫、盧文弨、顧嗣立、黃丕烈、錢泰吉……等。^[80]在這些鈔本及稿本中，鄭振鐸相當推重購自劉晦之的《全唐詩》輯本，他認為：^[81]

季（按：即季滄葦）輯《唐詩》（見圖四）之底本，……敞意大可取也。以其中剪貼之本，佳品不少，實集唐人集之大成！可作為重輯全唐詩之基礎。……其中，如王勃詩，即全採取嘉靖本五十《唐人小集》（想此五十集必全收在內），……菊老（張元濟）云：尚有宋刊本在內，此書不僅足發清廷竊取季氏書之覆，且實足以匡正《全唐詩》妄改妄刪之謬不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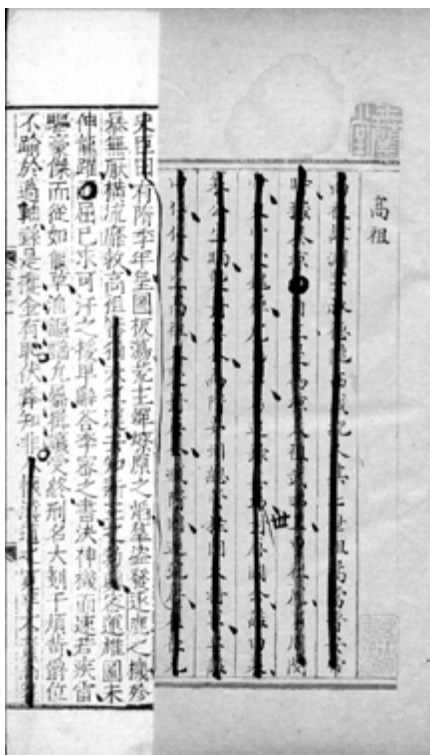
^[77] 同註10，頁78。

^[78] 同註2，頁92。

^[79] 同註10，頁206。

^[80] 同註2，頁74-75。

^[81] 同註4，頁21-22。



圖四：《唐詩》共七百一十六卷119冊，
(清)錢謙益編 清初錢季二氏遞輯底稿本(館藏編號14162)。

此外，鄭振鐸零星購入的稿本中也有極重要的史料，例如：^[82]

莫氏稿凡四冊，甚佳，又趙氏稿較蕪雜（另人批：名烈文字勤菽曾任易州知州。）然亦材料書也。（尚有七冊未寄到）茲併奉上八冊。（共十二冊）

鄭振鐸認為「甚佳」的莫稿殆為莫友芝稿，本館館藏莫友芝遺稿一共有3部，分別是8種13冊、16種38冊、40種79冊，惟不見此4冊稿本。另鄭振鐸初看一半，印象「蕪雜」的趙稿^[83]，若是館藏趙烈文的《能靜居日記》，雖然因為是手寫草書而蕪雜，但實際上它是一部近代史的重要史料。^[84]

當然以張壽鏞、鄭振鐸對古籍瞭解的深入，再加上徐鴻寶對版本的精擅，

[82] 同註4，頁202-203。

[83] 同註4，頁203。

[84] 吳相湘先生認為《能靜居日記》是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珍貴史料，其價值包括：記載曾國藩公私生活言行、保存曾、趙二人對宮廷人物及其舉措的言論、提供湘軍克復南京情形最重要的史料、保存極多有關太平軍行動的資料（吳相湘，〈趙烈文能靜居日記的史料價值〉，載於趙烈文，《能靜居日記》（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民53），冊一卷前，頁1-22）。

所選購的書都堪稱是精華，以上不過舉其犖犖大者，難盡其詳。在諸多購入的書中，有幾部宋元本別有特色，屬於版本學上習稱的「公文紙本」^[85]，包括購自張芹伯的宋刊《北山小集》、《李賀歌詩編》及零星購來的元刊《中庸集解》，這些書的書頁背面用的是當時廢棄的公文，或為收糧案牘或為帳冊簿籍，是記錄地方社會及經濟的重要史料。

六、淪陷區購書的關鍵人物—鄭振鐸

(一) 從文學健將到文獻衛士

儘管參與淪陷區蒐購古籍的重要人士不少，包括在上海的張壽鏞、何炳松、張元濟、鄭振鐸；在香港的葉恭綽；在重慶的蔣復璁以及由重慶到上海的徐森玉等，但無庸諱言鄭振鐸才是這一場硬仗的關鍵人物，尤其在上海這個主戰場，他在前線蒐書、鑑定、論價，也在後方查點、登記、編目；他在為節省國家經費斷口論價斤斤計較；也在為中央圖書館規撫可長可久的國家文獻大業，這樣的鄭振鐸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鄭振鐸，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民國前13年）生，畢業於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北京交通大學的前身）。讀書時醉心文學，曾經參與五四運動，為學生代表，其後並參與編印刊物、籌組文學社團。鄭振鐸頗富創作力，散文、新詩、小說、譯述齊頭併著。民國初年的新文化運動帶動了當時的知識界「整理國故」，鄭振鐸也廁身其中，他除了撰寫《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俗文學史》等文學史論外，並且編寫及刊印若干大部頭書刊，諸如《中國版畫史圖錄》、《中國歷史參考圖譜》（見圖五）以及《古本戲曲叢刊》等。鄭振鐸一生愛書，他為讀書、編書而買書，民國20年起，他陸續任教北平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及上海暨南大學，民國24年復出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抗戰期間鄭振鐸仍駐留上海，此時他獲知明趙琦美脈望館舊藏的《古今雜劇》復現，並且還是趙琦美親手抄寫編定，這部《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共收元明雜劇242種，其中刻本69種，抄本173種，是流傳後世最大的一部戲劇總集，且其中大部份久經散佚，世人不知。於是鄭振鐸四處蒐訪這部書的下落，幾經波折，終於將此書購得，後歸北平圖書館收藏。

^[85] 宋、元、明時地方刻書，多有利用公文紙背面印書。



圖五：《中國版畫史圖錄》共4冊，鄭振鐸編。
上海：中國版畫史社，民29-31(館藏編號26368)。

《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是他為國家購存的首部古籍，鄭振鐸在《劫中得書記》的序裡說：^[86]

我在劫中所見、所得書，實實在在應該以這部古今雜劇為最重要，且也是我得書的最高峰。想想看，一時而得到了二百多種從未見到過的元明二代的雜劇，這不該說是一種『發現』麼？肯定地，是極重要的一個『發現』。不僅在中國戲劇史和中國文學史的研究者們說來是一個極重要的消息，而且，在中國文學寶庫裡，或中國的歷史文獻資料裡，也是一個太大的收獲。

鄭振鐸購得《古今雜劇》欣喜異常，時在民國27年，雖然他認為「這個收獲，不下於內閣大庫的打開，不下於安陽甲骨文字的發現，不下於敦煌千佛洞抄本的發現。」^[87]但是若要和他三年之後為中央圖書館所蒐購的上萬種古籍相較，顯然後者的影響絕不亞於前者。

鄭振鐸一生愛書、購書、讀書，又編書，蘇精撰《近代藏書三十家》，鄭振鐸「玄覽堂」名居其一，蘇精並以「文學的健將，狂熱的書痴以及文獻的衛士」三個不同的角色來形容鄭振鐸「與書共舞」的一生。

(二) 全心投入古籍蒐購

促使鄭振鐸全心悉力投入古籍蒐購的原因其實不祇一端，他認為這是書生報

^[86] 鄭振鐸，《失書記》（臺北：網路與書，2007），頁86-87。

^[87] 同註86，頁87。

國所能展現的具體行動，除了避免後世子孫要遠渡重洋去研究國故以外，更可為國家府庫充實文獻資源。

鄭振鐸將在淪陷區購書視同上戰場作戰，他說：^[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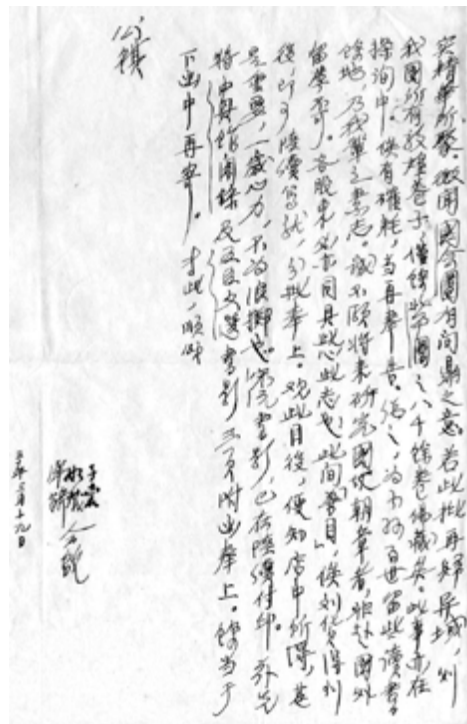
……為國家保存文化，如在戰場上作戰，祇有向前，絕無逃避。且究竟較馳驅戰場上之健兒們為安適。每一念及前方戰士們之出生入死，便覺勇氣百倍，萬苦不辭。

鄭振鐸也將購書之舉視作替後世子孫存留國故文化據以研究的材料，他說：^[89]

我輩對於民族文獻、古書珍籍，視同性命，萬分愛護，凡力之所及，若果有關係重要之典籍圖冊，絕不任其外流。

又說：^[90]

為子孫百世留些讀書餘地，乃我輩之素志。誠不願將來研究國故朝章者，非赴國外留學不可。（見圖六）



圖六：「文獻保存同志會」致蔣復璁函（民國30年3月19日）

[88] 同註4，頁141。

[89] 同註2，頁74、89。

[90] 同註2，頁89。

除了為後代累世保存國家的文獻以外，鄭振鐸也希望能夠藉此建立並充實中央圖書館的藏書，他說：^[91]

如能以我輩現有之財力，為國家建立一比較完備之圖書館，則於後來之學者至為有利，其功能與勞績似有過於自行著書立說也。擴而充之，他甚至將購書之舉視為是國家建立過程中應行實現的一項工作。

鄭振鐸投身古籍蒐購的動機是多方面的，而他投入的心情和態度也是嚴肅的，他說：^[92]

我輩對於國家及民族文化均負重責，只要鞠躬盡瘁，忠貞艱苦到底，自不至有人疵議。蓋我輩所購者，決不至浪費公款一絲一毫；書之好壞，價之高低，知者自必甚明瞭也！一方面固以節儉為主，同時亦應以得書為目的；蓋原來目的，固在保存文獻也。浪費、亂買，當然對不住國家，如孤本及有關文化之圖書，果經眼失收，或一時漏失，為敵所得，則尤失我輩之初衷，且亦大對不住國家也。故我不惜時力，為此事奔走。其中艱苦，誠是「冷暖自知」。

鄭振鐸為購買多方奔走，箇中艱辛，雖是「冷暖自知」，但也有「甘之如飴」的感覺，他說：^[93]

雖斷斷論價，事極瑣屑，鑒別板本，頗費辛苦，而取十一於千百，一旦獲有精品或孤本，便足償數日乃至數月之辛勞而有餘。獨惜可與「奇文共欣賞」者不多耳！

即至徐鴻寶來滬，鄭振鐸終於得有知音「奇書共賞」，他曾說：^[94]

各書經森公（註：徐鴻寶字森玉）審閱，如得一知音。每有為其十數年前所曾獲觀者。如見故人，彌增感慨！亦有為其所未見者，則往往拍案叫絕，不忍釋卷。披書欣賞，相識而愛。「解人」忽得，深為「書」幸！相聚數月，快慰之至！

鄭振鐸極重名節，既將購書視作「鞠躬盡瘁，忠貞艱苦到底」的重任，無論在報酬或名義上亦尤其謹守分際。他曾經兩度致函蔣復璁館長拒絕受酬，第一封

^[91] 同註2，頁83。

^[92] 同註4，頁23。

^[93] 同註2，頁78。

^[94] 同註2，頁88。

信（見圖七）中說：^[95]

弟束髮讀書，尚明義利之辨，一腔熱血，愛國不敢後人。一歲以來，弟之所號呼，廢寢忘餐以從事於搶救文物者，純是一番為國效勞之心。若一談及報酬，則前功盡棄，大類居功邀賞矣，萬萬非弟所願聞也。尊處如亦允二公（註：何炳松及徐鴻寶）所請，竟欲付弟以報酬或任何名義，則弟只好拂袖而去，不再預問斯事矣！……書生報國，僅能收拾殘餘，已有慚於前後方人士之喋血殺敵者矣。若竟復以此自詡，而貿然居功取酬，尚稱自稱為「人」乎？望吾公以「人」視我，不提報酬之事，實為私幸！



圖七：鄭振鐸致蔣復璁函（民國30年2月26日）

鄭振鐸報國情深的滿腔熱忱，在這封信中表露無遺。第二封信則強調已支領暨南大學薪水（鄭振鐸時任暨大教授兼文學院長），當遵守「兼職不兼薪」的規定，絕不另外接受支酬。^[96]卻酬一事足見鄭振鐸不僅愛書愛國，更重視名節。

^[95] 沈津，〈鄭振鐸致蔣復璁信札（上）〉，《文獻》，2001：3（2001.7），頁264。

^[96] 同註95，頁268。

(三) 具有強烈的使命感

鄭振鐸愛書如命，蘇精曾以「狂熱的書痴」來形容他的嗜書若渴。^[97]而「書」祇不過是他那強烈使命感的表現管道之一，從他大量的文學創作、古籍整編以及為私也為公蒐購文獻，在在說明鄭振鐸擁有澎湃的熱情、無窮的精力和強烈的使命感。在淪陷區購書一事上，鄭振鐸將他的熱忱和執著表現在多方面上。

第一方面是在他全力購書上義不顧身的犯難態度，鄭振鐸多次將在淪陷區蒐購古籍比喻是「上戰場作戰」，他曾在〈劫中得書記〉說：^[98]

夫保存國家微獻，民族文化，其辛苦因未足埒攻堅陷陣，捨生衛國之男兒，然以余之孤軍與諸賈競，得此千百種書，誠亦艱苦備嘗矣。

他所面對的雖然不是槍林彈雨，但也是危機四伏，敵僞不斷在偵緝他，以至他連家都不敢歸，在這段時間自然也與家人隔離。在淪陷區內，物資既缺乏，精神又苦悶，支撐鄭振鐸堅持不輟的動力既是他的民族氣節，也是他的熱忱與執著。

第二方面是在他拒絕酬勞上的操守和原則，當時的上海，通貨膨脹，物價波騰，鄭振鐸以操守自礪，謹守一份暨南大學教授的薪給，雖全家十多口仰俯以賴，但他堅決不肯接受分文酬勞，並且卻酬的立場和口氣都至為堅定，他函告蔣復璁說：「尊處……竟欲付弟以報酬或任何名義，則弟只好拂袖而去，不再預問斯事矣！」^[99]說到後來，甚至語出：「……貿然居功取酬，尚能自稱為『人』乎？望吾公以『人』視我，不提報酬之事。」^[100]

第三方面是在他購進古書上的得與失，「求書」、「得書」在鄭振鐸的生命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他早年常舉債買書，甚至典當舊書換取新書，在求書的過程中，他常處在既患得也患失的心境，他曾經剖白自己對書的深情，說：^[101]

余素志恬淡，於人世間名利，視之蔑如。獨於書，則每具患得患失之心。得之，往往大喜數日，如大將之克名城；失之，則每形之夢寐，耿耿不忘者數月數年。

^[97] 同註10，頁177。

^[98] 同註86，頁83。

^[99] 同註95，頁264。

^[100] 同註95，頁264。

^[101] 同註86，頁167。

另外，他在給張壽鏞的信中也傾訴買不到書的失望：^[102]

近日連遭失敗，心中至為憤懣！徐積餘氏之方志恐已失去，（至今無消息）劉晦之之宋本亦已被奪，前日所談之宋余仲仁本《禮記》（余本極佳而少見……），來青閣亦已變卦，……。奈何？奈何？終夜徬徨，深覺未能盡責，對不住國家！思之，殊覺難堪！殊覺灰心！……日來悲憤無已，祇好向先生一傾吐之。

鄭振鐸求書心切，以至於往往遇購書有變化即遷責於對方，在他的信中，劉承幹「頗懦弱寡斷」^[103]，而張芹伯更是「反覆無常，言而無信。」^[104]殊不論劉、張兩位是否實即如此，但鄭振鐸對「購書」的投入與執著於茲可見。

鄭振鐸澎湃的熱情充滿在他求書的信函和報告中，可見他在淪陷區中是如何想藉著蒐購古書有所作為，以恪盡書生報國的夙志。鄭振鐸將他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這保存文化命脈的戰場上，而他也確實做到了自己所形容的「鞠躬盡瘁，忠貞艱苦到底。」^[105]

七、結 論

鄭振鐸曾敦促當局買下《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他深感欣慰，特別寫了一篇長跋詳述其經過，並誌重要。相對於這部《古今雜劇》從他手中被再發現所得到的快慰，鄭振鐸並沒有就抗戰時期在上海淪陷區蒐購古籍這件事寫過任何文章。而這一個蒐購行動完成後的40年間，在其他公私記載中也都沒有人提及鄭振鐸參與其事。^[106]

為什麼鄭振鐸本人從不提寫這段經過，可能是因為他與當時的國民政府不相謀，而這批書是由國民政府在南方籌備成立的中央圖書館所購藏，以致他不願意多提此事。至於其他與聞此役的當事人，如本館前館長蔣復璁也因為政治環境，在之後發表的作品中，略去了鄭振鐸與抗戰蒐購古籍的關係。若非記錄這件活動

^[102] 同註4，頁256。

^[103] 同註4，頁208。

^[104] 同註4，頁267。

^[105] 同註4，頁23。

^[106] 蘇精寫〈鄭振鐸玄覽堂〉說：「抗戰勝利不久，鄭振鐸……寫《蟄居散記》、《劫中得書記、續記》……始終沒有提到冒險參加政府在上海搶救古書的事……。」見《近代藏書三十家》，頁181。另同文蘇精又說：「……在後來的公私記載中，都有意無意的被忘記了。」見《近代藏書三十家》，頁184。

的許多檔案和書信被保存下來，今天我們根本無緣去瞭解當時所發生的過程和細節，也不會明白鄭振鐸廁身其間的經過。

今天我們能對這段館史有更深的認識，包括鄭振鐸與抗戰蒐購古籍的關係，是透過兩個來源，第一是本館從南京攜來的舊檔案，其中有部分是當年在上海淪陷區購買古籍的紀錄，蘇精即以這些材料為主，寫成〈抗戰時秘密搜購淪陷區古籍始末〉^[107]，這是完整記載此事的第一篇作品，也是首先提到鄭振鐸參與此事的作品；第二是鄭振鐸寫給張壽鏞的三百多封書信，收在劉哲民、陳政文所編的《搶救祖國文獻的珍貴記錄：鄭振鐸先生書信集》^[108]，由其中可以窺見當時鄭振鐸在第一線是如何地苦心操持。幸有上述這一批檔案和書信，後人才能據以勾勒出整個蒐購工作的全貌；不僅如此，也才能將鄭振鐸在整個蒐購工作所扮演的角色還原過來，並且進一步瞭解當年鄭振鐸內心深處的澎湃思緒。

書信在追尋歷史、探索人物的過程中扮演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吳銘能認為：^[109]

……書信原跡筆觸不經意所反映一個人內心深處最細微、最錯綜複雜的思緒，在後人編纂文集中是不易顯見的，同時，也最被忽略，唯有深入其間反覆模擬想像彼時環境氛圍，體會作者悲、欣、愁、嗔等情感，企圖使「場景再現」，透過書信原件的「抽絲剝繭」，其文獻的價值自然彰顯。

作者在這段文字的最後兩句話強調「書信的文獻價值」，本館所保存的這一批館史檔案，包括其中的許多書信，可以為「書信的文獻價值」再次提供證明。

致 謝

本研對於審查者所提供的意見及指導，謹此致謝。

參考文獻

吳銘能。〈北京大學收藏「梁啓超給蹇季常等書信」書後--兼談書信的文獻價值〉，《書目

^[107] 同註5，自序，頁2。

^[108] 同註4。

^[109] 吳銘能，〈北京大學收藏「梁啓超給蹇季常等書信」書後--兼談書信的文獻價值〉，《書目季刊》，34：1（2000.6），頁95。

- 季刊》，34：1（2000.6），頁83-97。
- 沈津。〈鄭振鐸致蔣復璁信札(上)〉，《文獻》，2001：3（2001.7），頁249-275。
- 沈津。〈鄭振鐸致蔣復璁信札(中)〉，《文獻》，2001：4（2001.10），頁214-228。
- 沈津。〈鄭振鐸致蔣復璁信札(下)〉，《文獻》，2002：1（2002.1），頁216-231。
- 沈津。〈鄭振鐸和「文獻保存同志會」〉，《國家圖書館館刊》，86：1（1997.6），頁95-115。
- 房鑫亮。《忠信篤敬：何炳松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 林清芬。〈國立中央圖書館與「文獻保存同志會」〉，《國家圖書館館刊》，87：1（1998.6），頁1-22。
- 何炳松。《何炳松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
- 俞信芳。《張壽鏞先生傳》（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 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編輯委員會。〈館史史料選輯〉《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6：1（1983.4），頁57-104。
- 張元濟。《張元濟致王雲五的信札：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七年》（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7）。
- 張元濟。《張元濟書札》3冊（北京：商務出版社，1997）。
- 陳立夫。〈國立中央圖書館在抗戰期間工作偶憶〉，《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6：1（1983.4），頁2-3。
- 陳立夫。《成敗之鑑：陳立夫回憶錄》臺初版（臺北：中正書局，1994）。
- 陳君葆著，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2冊（香港：商務印書館，1999）。
- 陳福康。〈鄭振鐸等人致舊中央圖書館的秘密報告（續）〉，《出版史料》，2004：1（2004.1），頁102-124。
- 陳福康。〈《鄭振鐸致蔣復璁信札》整理中的錯誤〉，《學術月刊》，2002：7（2002.7），頁90-93。
- 陳福康。〈鄭振鐸等人致舊中央圖書館的秘密報告〉，《出版史料》，2001：1（2001.1），頁87-100。
- 陳福康。《鄭振鐸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 劉作忠。〈同志會的壯舉—鄭振鐸搜藏、搶救古籍軼聞〉，《黨史縱橫》，1997：2（1997.2），頁26-27。
- 劉哲民、陳政文合著。《搶救祖國文獻的珍貴記錄：鄭振鐸先生書信集》1版（上海：學林出版社，1992）。
- 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第2冊（臺北：傳記文學，1977）。
- 蔣復璁等口述，黃克武編撰。《蔣復璁口述回憶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
- 蔣復璁。〈全唐詩稿本的來源〉，《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訊》，10：1（1988.2），頁1。
- 蔣復璁。《珍帚齋文集》5冊（臺北：臺灣商務，1985）。
- 蔣復璁。〈我與中央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6：1（1983.4），頁6-11。

- 蔣復璁。〈重印玄覽堂叢書初集後序〉，《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4：1（1981.6），頁56-57。
- 蔣復璁。〈涉險陷區訪「書」記〉，《中央月刊》，2：9（1970.7），頁91-94。
- 蔣復璁。〈一剎那中的決定〉，《傳記文學》，3：1（1963.7），頁29-30。
- 鄭振鐸。《失書記》（臺北：網路與書出版，2007）。
- 鄭振鐸著，陳福康整理。《鄭振鐸日記全編》（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
- 鄭振鐸。《西諦書話》2冊（北京：三聯書店，1983）。
- 鄭爾康。《鄭振鐸》1版（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 盧錦堂。〈抗戰期間中央圖書館搶救我國東南淪陷區散出古籍相關工作報告書之一考察〉，載於：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第一屆東亞漢文文獻整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尚未出版（臺北：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2008）。
- 盧錦堂。〈屈故館長翼鵬先生與國立中央圖書館在抗戰時期所蒐購我國東南淪陷區之古籍最精品〉，載於：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國家圖書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屈萬里先生百歲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家圖書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7），頁71-91。
- 盧錦堂。〈抗戰時期香港方面暨馮平山圖書館參與國立中央圖書館搶救我國東南淪陷區善本古籍初探〉，《國家圖書館館刊》，92：2（2003.10），頁125-146。
- 盧錦堂。〈從抗戰期間搶救珍貴古籍的一段館史說起〉，《國家圖書館館刊》，90：3（2001.8），頁6-8。
- 盧錦堂。〈國立中央圖書館古籍蒐藏與整理〉，《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26：1（1993.4），頁149-165。
- 韓文寧。〈鄭振鐸滬上「搶救」珍本古籍〉，《民國春秋》，2001：2（2001.2），頁14-18。
- 韓文寧。〈搶救民族文獻—鄭振鐸先生對中國古籍文化的貢獻〉，《圖書與情報》，1999：2（1999.2），頁73-76。
- 蘇精著。《近代藏書三十家》（臺北：傳記文學，1983）。
- 蘇精。〈張壽鏞在財政、教育與藏書事業上的貢獻〉，《傳記文學》，43：2=255（1983.8），頁115-118。
- 蘇精。〈藏書家的鄭振鐸〉，《傳記文學》，40：5（1982.5），頁59-65。
- 蘇精。〈藏書校書印書的張元濟〉，《傳記文學》，40：1（1982.1），頁97-101。
- 蘇精。〈藏書之鄉、藏書之家〉，《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14：1（1981.6），頁25-33。
- 蘇精。〈抗戰時秘密搜購淪陷區古籍始末〉，《傳記文學》，35：5（1979.11），頁109-114。

Zheng Zhenduo and the Rare Books Purchased in Shanghai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Li-jen Ku Ching-ling Juan

Abstract

Following the fall of Shanghai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1940-41, large quantities of rare books were released from the hands of private collectors and were sold on the open market. There were many buyers eager to purchase these books, including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representatives from countries such as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an attempt to prevent these valuable books from being moved abroad, a few scholars formed a team called the "Document Preservation Comrades."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Government, they cooperated with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o begin buying up these books. In this way, many fine books from important private collections were retained, and in the process the well-known rare book collections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were formed.

Keywords (關鍵詞) : Cheng Chen-tou ; Chinese Rare Collection ; Documents Preservation Comrades ; Library Archives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鄭振鐸 ; 中央圖書館 ; 明代史料 ; 善本古籍 ; 國家圖書館

Li-jen Ku : Specialist,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Publications,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
E-mail: klj@ncl.edu.tw

Ching-ling Juan : Assistant Editor, Special Collection Divisio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 E-mail:
cljuan@ncl.edu.tw

This article first summarizes the main points of the acquisition of these rare books in Shanghai, and then describes in detail the objectives of the project and the methods used. The contents of the acquisition are then summarized in four categories: Ming dynasty historical documents, *Si ku quan shu* 四庫全書 related writings, Song and Yuan woodblock prints, and handwritten and proofreading copies and manuscripts. Finally, the article emphasizes the role Zheng Zhenduo 鄭振鐸 play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acquisition as task planner and coordinator, buyer, and cataloguer.

This article draws from many original documents including several work reports written by Zheng Zhenduo himself, and surviving correspondence with his team. Many of these documents are preserved in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s collection.

